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发展中英关系应注意的复杂因素

□ 崔洪建

习近平主席对英国的重要访问将中英关系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今后一段时期，中英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以及人文、社会交流有望获得更高品质的提升，并势必对各自地区形势乃至国际格局变化产生影响。

中英关系进入“黄金时代”

习近平主席对英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开启了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成为今年中英、中欧乃至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一场重头戏。近年来，中英不断形成政策共识的基础是看好彼此的发展前景并视对方的发展为自身机遇。无论是英国成为西方经济体中率先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由此引发了亚投行的“世界波”效应，还是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在访华之后重申英国政府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英方对中国投资的“全领域开放”的承诺，英国方面的积极态度和开放立场赢得了中方的信任和肯定，双方政治互信的进一步提升，催生了“黄金时代”的到来。

未来一段时期中英双方的合作，中英关系的改善和继续推进，仍然需要通过经贸投资和金融领域等合作来加以实现，但英国内政形势、英国与欧盟关系走向、英美关系以及英国对亚洲政策等因素仍将对中英关系产生直接影响。在对中英合作的未来充满期待的同时，应对上述复杂因素保持高度关注。

英国内政因素仍有不确定性

首先，中英在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异将长期存在，并会不时反映到政治层面，如果英方不能顶住压力、妥善处理，就有可能对合作形成阻力。中英目前的良好关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双方克服了之前的政治障碍，并就在政治领域合理管控分歧达成共识。但双方在涉藏、人权以及香港等问题上的分歧仍将长期存在，并成为英国国内一些势力“质疑”中英接近、“唱衰”中英合作的主要理由。在习近平主席访英前，部分英国舆论就对卡梅伦政府施压，要求其在两国领导人会谈中“讨论”人权议题，同时还挑动工党领袖科尔宾在与习主席会晤中提出人权问题。由于近年来英国国内政治的民粹色彩增加，英国媒体又素来以“民意”之名对政治影响颇深，因此尽管目前英国政府对于分歧的处理已较为冷静成熟，但仍需考虑其在舆论和媒体压力面前可能出现的软弱和动摇。

其次，英国国内对中英构建“利益共同体”的现实、路径和目标仍有不同认识，如果分歧扩大就有可能对合作形成压力。经贸合作是打造中英“利益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但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正成为中英经贸合作亮点的同时，英国国内仍有部分舆论抱着旧有思维，对中国投资、技术进入这些领域怀有戒心和疑虑。它们或是以美国对待中国企业的态度为参照，认为中国投资或企业“有政府背景”，将威胁英国的国家安全；或是以“对等开放”为诉求，要求中国也在相关领域对英开放，而罔顾两国在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为此，既需要对英方某些观点适时予以反驳，同时又要用事实和行动来回应这些疑虑，并将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国内改革的动力。

最后，当前英国政府的发展优先战略以及对国际格局变化的深刻认知，是决定以卡梅伦、奥斯本等为代表的政治家勇于调整对华政策的基本因素，但仅将对华政策维系于某届政府或某些政治人物，显然会给中英合作的未来带来不确定性。英国政府以及保守党内部就中英合作达成共识，是英方政策调整的主要推动力。开启中英合作“黄金时代”的提法最早就来自英国政府的积极表态，尤其体现了其首席大臣兼财政大臣奥斯本对于“通过对华合作来解决英国国内发展问题的思路”，以及卡梅伦首相对此的坚定支持，这从英国率先宣布加入亚投行后暴露出来的英国政府内部外交部门和财政部门之间的分歧中就可以看出。为此英国媒体特意用“奥斯本主义”一词来形容当前主导英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某种个人因素。考虑到奥斯本在英国政府乃至保守党内的声望正处于上升阶段，并有可能成为卡梅伦的政治接班人，不排除当前英国对华政策具有个人因素。为牢牢把握合作机遇，将英方对华合作的积极态度从个人和党派层面提升至执政党、各政治力量乃至主流民意共识的层面，应成为今后中英政治对话和人文交流的主要目标。

英国与欧洲国家关系走向将产生影响

目前英国国内的一项重要政治议程是将就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决。从最新民调结果来看，支持继续留在欧盟的英国民众多于要求退出的，但领先优势不大，而且差距还在缩小，因此公决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无论英国民众最终作何选择，都将对中英、中欧关系产生直接影响。

要确保英国民众选择留在欧盟，当前卡梅伦政府与欧盟就“改革”进行谈判的进程和结果至关重要。最为理想的结果是，英国以保持其在经济、金融、移民等领域的自由度为条件继续留在欧盟，这样当前中英、中欧关系的格局将基本得以延续。中方可以继续寄望于英国在欧盟内部发挥支持投资自由化和市场开放的积极作用，共同抵御保护主义。另一种情况是，谈判结果对英国不利但英国不得不留在欧盟，则中英合作对中欧关系的带动作用会下降，涉及贸易、投资等中欧经贸合作的主要合作渠道将转向布鲁塞尔和柏林。如果英国最终选择退出欧盟，它仍将采取某种模式，如与欧盟商签自贸协定等，继续获取来自欧盟市场的利益，同时在开拓欧盟以外市场方面获得更大自由度，但其与欧盟进行经贸活动的成本将上升，经贸谈判能力也将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和英国作为中方重要经济伙伴的地位将下降，中方在英国市场获得更大自由度的同时，会影响与其他欧陆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的合作。

英国全球“平衡外交”的影响

与对华务实外交同时推进的，是英国着眼于其全球利益的“平衡外交”。在与中国发展经贸为主的合作同时，英国在安全领域也加强了与美国的协调。卡梅伦政府承诺将国防开支提升到占GDP2%的水平，已满足来自美国和北约的要求，同时在网络、海洋安全等中美之间重要安全议题上有向美靠拢的意向。与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经济与安全议题相互矛盾甚至对立的情况不同，英国目前更有能力和资源同时在经贸与安全领域与中美保持合作关系，但这也取决于中美关系的走向。同时，英国近年来还利用其在亚洲的传统影响，加强了与亚洲其他国家如日本、印度和东盟的关系。英国是最早与日本建立“2+2”磋商机制的欧洲国家，在军事交流方面两国关系密切；英国还利用其历史上与印度的宗主关系，在山地作战等方面与印有合作；英国还是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内的“亚洲五国联防协议”体系的唯一欧洲成员国。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英合作的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在积极进取的同时保持足够的冷静，尤其需要从英国国内因素着手，避免英国的务实外交向“投机外交”蜕化，同时要在处理其他双边和地区关系是考虑英国因素，避免英国的“平衡外交”向于我不利的“制衡外交”转化。

国际政治

“大西方”理念下的欧洲政经发展战略

□ 赵　柯

“唱衰欧洲”“看空欧洲”近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以及政策界非常流行。比如，英国《金融时报》在今年10月份的一篇评论文章就认为，欧洲正疲于应对五场未曾预见、正处于不同阶段的危机：难民危机、欧元区外围国家债务危机、全球经济低迷、乌克兰危机以及大众汽车丑闻。种种“利空”消息让很多观察人士认为欧洲前途暗淡。究竟该如何客观地看待欧洲，欧洲是否有能力走出“艰难时世”？

欧洲经济：以改革促增长

2013年是欧洲经济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欧洲经济复苏的势头逐渐企稳，当年第四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0.3%，更为重要的是，欧元区六大经济体（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全都在第四季度实现正增长，这是自2010年以来的头一次。此外，无论是欧盟整体还是欧元区，经常账户顺差持续增长。

欧盟委员会在2015年2月发布的《冬季经济预测》报告中认为，欧盟已进入了第三年的复苏，预计2015年，欧盟成员国将全部实现正增长，失业率逐步下降，通胀率继续维持较低水平，赤字率和债务率持续下降。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相较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欧盟经济增长不仅微弱，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停滞”，那么欧盟的经济是否真得像一些评论所说的那样经历一个“失去的十年”？情况并非如此，欧洲的政治精英们现在要做的，不能简单地通过财政刺激来推高促进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要实施着眼于欧洲未来竞争力的结构性改革。欧盟经济的这种低增长正是改革阵痛的体现。

当前欧盟经济虚弱的根源不是债务危机，而是欧盟国家内部不适应全球化竞争的经济社会制度。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缺乏财政可持续性的社会福利制度；二是缺乏弹性的劳动力市场。这也构成了所谓“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但这些改革涉及欧盟国家强大的利益集团，推行起来阻力重重。此次债务危机的爆发为欧洲的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欧洲的政治精英们显然也没有“浪费”掉这次危机，而是及时把握住机会，实施了早已成为共识但却迫于国内压力而一直停滞不前的结构性改革。这次欧洲的领导人进行改革的勇气和决心要比之前坚定很多，并非单纯是为了应对此次债务危机，而是欧洲政治经济精英们的共识：将危机作为推进欧洲改革与转型的契机和合法性来源，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提升和重塑欧洲在全球的经济竞争力。

欧盟政治结构：德国成为领导核心

欧债危机以来欧盟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德国地位的上升成为不争的事实，德国与欧洲的关系再次受到瞩目。

后危机时代的欧盟面临三个主要任务：一是恢复经济增长。当前欧盟经济的复苏仍然具有不确定性，逆转的风险是存在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复苏缺乏经济企稳的有力支撑。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是衡量一国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欧元区的CPI已经长时间处于1%以下。第二，虽然欧盟经济整体实现正增长，但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这种“无就业增长”如果长期持续，不仅会影响宏观经济，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二是完善银行业联盟的建设。银行危机与政府财政危机之间相互传染是此次欧债危机的重要原因，建立银行业联盟，切断两者之间的恶性循环是将来预防类似危机再度爆发的重要举措。三是财政一体化。这是从根本上消除欧元制度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分离这一内在缺陷的解决途径，在基本制度层面避免危机重演。对于这三大任务，德国正凭借其主导地位进一步发挥直接影响，将自己的理念渗透到了宏观层面的欧洲一体化制度建设和微观层面的经济运行之中。

除了经济事务外，德国在欧盟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发言权也越来越大，正在取代传统上法国在这些领域的主导地位。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中，德国扮演了代表欧盟的“总协调人”的角色：一方面努力与美国和乌克兰达成一致的立场，小心谨慎地控制着制裁的规模与节奏，迫使俄罗斯妥协；另一方面利用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成为俄罗斯与西方世界谈判沟通的桥梁。当前德国在事实上主导着欧盟的对俄政策，迄今为止欧盟所提出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还是遵循德国的思路：遵守明斯克协议。而明斯克协议的基本内容就是之前德国提出的解决路径：乌克兰实施某种形式的联邦制，东部享有特殊的自治地位，可以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但乌克兰的主权统一要得到保障。

如果说债务危机让德国获得了欧洲的经济主导权，乌克兰危机又大大增强了德国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话语权；那么此次对欧洲遭遇的难民危机的处理，则让德国在欧洲内的领导地位具有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在意识到很难阻挡难民涌入德国之后，默克尔采取主动，欢迎难民来德国，虽然因为各方面原因，德国随后又收紧接收难民的条件限制，但仍然给法国和英国等其他较大的欧盟成员国带来了道德上的压力，也让德国拥有了其他欧洲国家无可比拟的道德高度，使得德国的领导权更为稳固。德国的“重新崛起”，使得欧洲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在政治上更具有凝聚力，在全球舞台上行动能力大为增强。

欧洲对外战略调整：打造“大西方”

欧债危机不仅影响了欧盟的政治经济形势，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欧洲政治精英对自身力量与外部世界的看法。他们发现欧盟不像他们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强大，而是完全暴露在经济全球化的风险之中，在当前的国际秩序下，欧盟是脆弱的。于是欧洲人开始思考重新构建国际秩序的安排，将对外战略的重点投向了大西洋，推动发达国家间更紧密的合作，并让这种合作进一步体制化，建立以欧美为核心的“大西方”。

“大西方”是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提出的一个概念，认为西方的衰落并非历史的必然，如果美国和欧洲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就可以塑造出一个更广大和更具活力的西方。他认为这个“大西方”的地盘将从北美一直延伸到欧洲，然后再进入欧亚大陆。布热津斯基的这一理念实际正在被欧洲人所实践。所以，我们看到，在2008年之前，无论是欧洲的政治家还是欧洲的学者，都非常喜欢谈论“欧盟是一支什么样的力量”，也非常强调欧盟这支力量不同于美国的所谓“独立性”和“独特性”。但2008年之后，欧洲的政策界和研究界对自身力量的看法普遍发生了改变，不再刻意强调欧洲在国际政治中相对于美国的独立性，而是转向加强欧美关系，害怕被美国人抛弃。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欧盟加快了新一轮全球自贸区谈判的步伐。以往欧盟自贸区谈判往往都是遵循国际分工与产业互补的原则，大多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而欧盟此轮自贸区谈判对象则集中在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同时，自贸区协定在内容上往往是全面和高标准的，而非传统自贸区谈判中以削减关税为主要内容，且所涉及的产业类别有限。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习惯于享受冷战结束所带来的20多年和平的欧洲人第一次切实地感受到了战争离他们并不遥远，欧洲的安全并非万无一失。这让乌克兰危机成为了欧美加强合作的另一个动力，特别是欧美在北约框架下合作。德国《世界报》在2014年刊发了一篇题目为“欧洲更依赖美国，而非中国”的文章，该文认为，美国对于欧洲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经贸上，美国是欧洲无可替代的盟友，政治上捍卫和平和自由，经济上则致力于开放市场、健全国际法治。欧洲如果以为，不依靠美国也能建立一个稳定的、符合西方构想的全球经济秩序，那简直就是无知，甚至傲慢。这应该是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前欧洲在对外战略方面的考量。

中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在传统上基于两个判断：一是欧洲人联合走一体化之路的目的之一是要摆脱美国的控制和影响，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独立的力量，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独立一极。二是成为独立一极的欧洲是平衡美国的重要力量。但从欧洲目前的对外战略来看，它既无独立于美国的雄心，更无意愿成为一支平衡美国的力量，而是在战略上加速倒向了美国，“大西方”正在从一个概念变成一种现实。这对中国构成了严峻挑战。

环球视野

热点透析

俄空袭叙利亚 反恐还是地缘争夺

□ 李子昕

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各方势力胶着混战。叙利亚政府军、亲叙利亚政府的什叶派军事组织、叙利亚反对派军事力量、库尔德人军事力量、打着“圣战”旗号的各类极端组织、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等各方势力纵横交错，包括其各自背后的支持力量，叙利亚内战俨然已成为“混战”一词的代名词。时至今日，已难以通过对各方简单的阵营划分来衡量彼此的敌我关系。国际社会取得共识的是：目前，伊斯兰国是本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恐怖组织之一；打击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本地区恐怖主义势力是各方共同的战略目标。

有鉴于此，叙利亚政府自叙内战伊始就将战争的性质定性为“反恐战争”，认为叙利亚内乱正是恐怖分子所挑起，叙政府军正在同所有“恐怖分子”作战。西方国家和其中东盟友各海湾君主国则认为，叙政府将国内武装反对派一概列为“恐怖组织”是“过度打击”，但也承认在反对派武装中存在极端“圣战”者，并同伊斯兰国一起对地区安全形成巨大挑战。支持叙利亚政府的什叶派组织、伊朗、伊拉克、俄罗斯则更多认同叙利亚政府的观点，特别强调叙政府在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中的关键性作用。

自叙内战以来，事态的恶化速度超乎绝大多数人的预期。受到西方和海湾国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在内战伊始，便衍生出诸多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这些组织有些在随后与反对派武装分道扬镳、另起炉灶，有些继续在反对派武装中伺机壮大，有些甚至直接表示对伊斯兰国效忠。与此同时，伊斯兰国组织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攻城掠地，叙利亚与伊拉克的边境已不复存在。伊斯兰国给地区安全和相关国家在本地区的利益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胁。2014年9月，美国牵头组建由54个国家组成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欧盟、北约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列。根据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多个场合的表态，美国组建该联盟是要通过和其西方及地区盟友的合作，加强在情报收集、武力打击、后勤补给、人员培训等多方面加强对伊斯兰国的打击力度。然而，愿景虽好，其实际效果却令人堪忧。由于该联盟过于松散，且多数成员仅限承诺提供后勤、武器、资金、情报及人道主义支援，实际打击力量较为有限。该联盟希望通过对伊拉克以及叙利亚温和反对派人员进行作战训练，来提升其战斗能力。然而在叙利亚如何准确界定温和反对派本身就是难题。由于拒绝同叙利亚政府进行合作，“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始终未能在叙利亚内部找到合适的地面支持方。通过与地面部队的配合，“国际联盟”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境内的部分区域施行了几次较为有效的空袭，然而“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力量暂未受到太大压力。这为其休养生息再度崛起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同时也促使其将作战重心转移到打击力量较为薄弱的叙利亚北部地区。

尽管出于外交辞令曾表达相关意愿，但受限于对伊朗和叙利亚政府的极度不信任，美国不愿与上述两国政府就打击伊斯兰国展开实质性合作。叙利亚政府军疲于应付反对派武装和所谓“圣战”组织，对伊斯兰国的打击也是有心无力。这使得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境内猖獗之势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打压。特别是今年以来，叙利亚反对派中的部分“圣战”组织有愈发活跃之势，尽管尚无明确信息表明其与伊斯兰国加紧勾结，但其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和行为的残酷性已与伊斯兰国一般无二。此次俄罗斯以“打击伊斯兰国”的名义对叙利亚展开空袭，无论是对伊斯兰国本身，抑或是叙境内极端“圣战”组织，都有较为强烈的震慑作用。

根据俄外交部信息，此次俄罗斯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得到叙利亚政府的邀请和允许，并同伊朗和伊拉克进行了直接合作。就目前得到的信息，俄罗斯此轮空袭主要针对叙北部极端组织较为活跃的地区以及伊斯兰国所占领的部分军事要塞和军火库。

无可否认，无论是美国组建“国际联盟”空袭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区域，抑或是俄罗斯联合两伊对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进行打击，其战略目的除了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外，亦均有地缘政治因素考虑：美国所联合的地区盟友多为逊尼派海湾君主国，而俄罗斯联合的则主要是与叙利亚阿萨德家族同为什叶派的伊拉克和伊朗。尽管客观上两股外部打击力量对于削弱地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有一定的作用，但世界两大军事强国在本地区以教派为标准划线组建联盟，难免会给本已混乱不堪的地区局势在另一个层面带来更大的潜在风险。美国表态希望俄罗斯能加入“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而非另起炉灶，但将自己的武装力量置于美国领导的国际行动中，对于俄罗斯而言实难接受。况且，即便如此，“国际联盟”鲜与叙利亚政府合作的态度对开展在叙境内的空袭亦将产生一系列地面保障和国际法相关问题。面对着西方国家一边倒的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强硬表态，如不及时对叙局势进行干预，将有难以估量的恐怖分子外流。

毋庸讳言，此次俄罗斯空袭叙利亚除了有打击极端分子之心，亦有保阿萨德政权之意。作为自始至终阿萨德政权的铁杆盟友，俄罗斯自叙利亚内战伊始就展现了对叙利亚政府的强力支持。俄罗斯对阿萨德政权的力挺出自俄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海湾国家一向与阿萨德政府不睦，但随着伊斯兰国的不断做大，其恐怖威胁已燃及自身。尽管极不愿意看到俄罗斯领导的“什叶派联盟”强势介入叙利亚局势，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也不得不隐忍。在近日普京和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到访的沙特阿拉伯国防部长萨罗曼的会谈中，双方商讨了叙利亚前途问题。拉夫罗夫在会谈后表示：“双方落实了沙特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相同目标。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不让恐怖主义哈利法掌管这个国家。”这实质上说明了阿拉伯之春后，本略有势弱的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有所提升；更直接地表明了沙特对于俄罗斯空袭叙利亚行动的默许态度。

事态发展至如此，俄罗斯已不可能轻易从叙利亚抽身，其必将面临与美国所领导“国际联盟”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而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的联合行动也需要这样的合作。同时，能否以打击“伊斯兰国”为契机促成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转寰，也考验着双方的外交智慧。

然而着眼当下，短期内纷繁的战火给地区局势带来的依旧是愈发严重的安全威胁，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流离失所。在恐怖主义、反政府武装和外国干预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叙利亚普通百姓，实是这场战争最大的输家。